

高 教 动 态

总第 24 期 2013 年第 1 期

嘉兴学院发展规划处 主办

2013 年 4 月 20 日

本 期 要 目

● 国内高教

- 河南一高校学术委员会初试去行政化 领导全退席 (1)
- 多位导师全程引领成长——浙江大学生物医学专业“导师体系”透视 (3)
- 上海交大与全球名校合作共建免费“移动课堂” (6)
- 北京工商大学：招生与就业对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7)

● 国外高教

改变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 5 个趋势..... (9)

美国大学生的学贷“必修课” (10)

法国“未来教师”职业助学计划鼓励大学生任教..... (12)

联合国发布 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 (13)

● 校长著述

耶鲁校长谈中国大学：中国学生大多擅长某一领域..... (14)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多管齐下，促内涵式发展..... (15)

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协同创新促高校三位一体发展..... (17)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大学创新活力应得到释放..... (21)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把握协同创新实质 推动高校科学发展..... (23)

● 专家视点

大学及其教授的使命..... (29)

中国大学，何时“世界一流” (30)

大学与社会的多边界..... (32)

教育形象现状总体趋好..... (34)

大学文化建设需走出误区..... (40)

● 国内高教

河南一高校学术委员会初试去行政化 领导全退席

近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新一届的学术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们都是普通教授，会议议题涉及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才能参与，还要回答委员们的问题。即便是校长，也是被邀请了才能参与。

这让教授们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

而此前，学术委员会委员一般都是清一色的院系领导，学术会议和行政会议几无区别。

没行政负担，讲话能放开

在一个月前进行的公选中，经全体教师投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正校级调研员、60 岁的仇建涛成为该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此前，校长、书记是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这在我国的大学生中是普遍现象。2011 年出台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校长担任，副主任委员由校长聘任，委员由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校长聘任。”

一些教师认为，“委员都是院系领导，开学术委员会和开校领导会议差不多。”

而本届学术委员会的 30 名委员，均由教师选举产生，条件是“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为保证各个学科都有发言权，每个院系一般有一个席位。委员会是对有关学术事项审议、评定、咨询和决策的最高机构，包括职称评定、科研决策、教师遴选等。同时硬性规定，现任领导不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仇建涛看来，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担任委员，有时间有精力办学术上的事情，另外这些人没有行政上的负担，各方面都能放开，“这实际上是‘教授治学’的一种探索。”

“校长们制定的东西再合理，也不如让教授们讨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李小建认为，现代大学应“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就需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适当分离。

这种想法很快得到省政府和省委组织部的支持，相关领导鼓励该校先行一步。

经过讨论选举，该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章程，包括几方面：一是现任领导和中

层正职不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二是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普通教授为主体；三是校学术委员会采取席位制，由民主选举产生；四是凡涉及学术的问题首先应由学术委员会研究，再提交校长办公室，切实尊重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利军说，这次变动给大家的感觉可以用“震动”形容。校领导的退出让学术委员会摆脱了行政干扰，普通教授在学术问题研讨、学术资源分配甚至学术标准认定上，有更多发言权，学校在学术问题的决策上，会更科学。

4月11日下午，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人事部，人事部门来旁听解答。平时就是校长，也是被邀请了才能旁听。”

“校长们在一起制定的东西再合理，也不如让教授们讨论讨论。”仇建涛说，教授治学，就是从细节做起，让大家有参与感，也是实现民主管理的途径。

“领导全部退席”，“一刀切”合适不？

此举虽然在河南高校是第一次推出，但几年前国内一些大学已开始尝试。

2010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除分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杨宗凯外，几位校领导全部退出；2011年3月28日，山东大学公布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名单中，没有校长徐显明的名字；吉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宣布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除了没有校领导，其下设的5个分会也不设主任。

“领导退席”曾引起热议。不少人认为，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大步；也有人提出，校领导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术水平完全够格入选，“一刀切”有矫枉过正、浪费人才的可能。

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行政领导未入选学术委员会，会不会影响其学术权威？

仇建涛认为，有些领导既是学校的行政领导，又是部分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一些行政领导，学术方面可能比我们做得还好，实现教授治学，当然包括担任领导但没有进入学术委员会的那部分教授，审议学术问题的时候，也要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

能否真正做到学术独立？

领导退席，学术是否能真正独立？坚称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称，如果没有行政级别，大学在实际管理中就会沦为弱势群体。“大小部门都觉得高你一等，简单的事情也可能要走几个月的程序。”

李小建说，“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弱化行政部门对大学的控制权，将学术权力归还给学术委员会和教授们。

没有领导参与的学术委员会，其地位如何保证？能否在重大学术事务上有决策权？仇建涛认

为，学术委员会是校长负责的教学科研工作的一部分，“只是适当分离，并不是彼此独立。”

学术委员会和校长办公室意见有分歧，听谁的？仇建涛说，如果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再想办法解决。但在他看来，“校长治校是法律规定，如果谁和校长发生分歧，那是他文件没学好。”

委员王利军也认为，当前做到完全独立是不可能的，但这一步迈出去，已经比以前“好得多”。

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任

开了“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先河的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马敏（现为该校党委书记）认为，该制度执行了3年，还算顺利，但“和当初设想也有差距”。

他说，在这3年，行政和学术配合得非常好，关于学术的问题都交由学术委员会讨论，行政上不干涉。学校关于学科设置等想法，如果学术委员会认为不合适，就听他们的。

在保证学术委员会独立上，马敏认为，关键要分清问题：评议问题一律听学术委员会的，涉及发展的听校长办公会议的意见。

另外，避免学术委员会流于形式的关键，除了制度约束，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任，“必须要很热心，有组织能力，敢说话”。

目前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有委员近20人，不过，大家平时比较忙，很难凑齐，活动有点少。马敏说，现在正考虑适当减少人员，保证11人到13人，然后分小组，有问题针对性讨论。下一步要考虑制订工作计划，“我们给学术委员会主任专门配了秘书，要多组织活动。”

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罗松远看来，这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现在都在探索。目前可能想到的好处是，过去教授做得好，都是“学而优则仕”，想去做个行政领导，但一旦做了行政工作，毕竟会弱化学术，现在让他们独立执掌学术委员会，可以学术做好了，依然有发展空间。

来源：大河网 2013年04月16日

多位导师全程引领成长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专业“导师体系”透视

以全程导师和专业导师相结合为主线，学长之友、英语之友和新生之友为辅助的“导师体系”，在学生成长的“关键期”，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人格塑造和创新科学精神培育，促进学生态度、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

4月1日下午，浙江大学生物医学专业本科一年级女生李禾园没有课，就钻进了基础医学院的

分子医学研究中心。这是李禾园进行“轮转见习”的第一天，导师柯越海教授给她安排的内容是：认识实验室成员，学习操作一个基本实验。

“生物医学”是浙江大学 2012 年获批组建基础医学试点学院后设立的新专业，也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生物医学专业。试点学院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在人才选拔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师管理制度及治理内部结构等方面进行改革，尝试知识、能力、视野和人文四层次兼备的生物医学本科人才教育新模式，培养兼具生物学知识和医学知识的复合型生物医学人才。

“本科教育，精细化培养是前提。”浙大基础医学院院长欧阳宏伟说。为了办好这个新专业，学院采取了以全程导师和专业导师相结合为主线，学长之友、英语之友和新生之友为辅助的“导师体系”，在学生成长的“关键期”，“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人格塑造和创新科学精神培育，促进学生态度、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

成长档案——记录导师对思想人文学术全方位指导

去年 11 月，浙大基础医学院邵吉民等老师专程来到大洋彼岸的布朗大学医学院，在那里，每一位本科生都有一位资深教授担任的“全程导师”，每个学生都有厚厚一本记录成长的“档案”。

“在学生的成长方面，教授的角色不能缺席。导师需要对学生的思想、人文、学术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引领。”邵吉民说，借鉴布朗大学的做法，浙大医学院把已有的导学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导师体系。他认为，从前的导师是一种“行政架构”，负责学生的学籍管理、成绩管理、班团活动等，这与学生的需求差距很大。导师群的架构，希望老师从以往“管理”的职能转变到“咨询”的职能，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一个面向学生的“咨询体系”。

生物医学专业出台的《导师计划》对“导师群”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提出了明确要求：教授的学术水平必须在专业内靠前才有资格担任导师。全程导师负责对一年级在学业发展、确立奋斗目标等方面进行全面指导；进入二、三年级，导师与学生共同制定个性化的专业培养计划，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四年级，全程导师还要指导学生完善国内外课程的衔接、学分互认以及进一步深造计划；与专业导师一起共同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写作及答辩。

《导师计划》还为“全程导师”设置了“规定动作”：从大一开始为每位学生建立“成长档案”——全程导师与每位学生每个月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如何解析困惑、助力成长，都要记录在案。

引领成长——使学生在迷茫中找到方向

去年 10 月，大学生活开始一个多月了，李禾园感觉自己还处于一种“迷茫而混乱”的境地，“有那么多的课程要学，还有那么多的活动要参加，要不要申请科研课题？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很多同学也面临着相似的困惑。李禾园把一封充满疑问的邮件发给了“全程导师”包爱民。包教授很快回

复，建议还在读大一的她先多花些精力打好知识的基础，科研训练项目可放到高年级或是假期中完成。这一邮件让李禾园找到了方向。

2013 年新学期开学，生物医学专业的每位同学都向班主任欧阳宏伟教授递交了一份学习心得：“终于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看懂全英文的教材了，也开始享受攻克一道难题后的舒畅。”“我感觉人生的乐趣就是不断挑战自己。”“我觉得在大学应该学习超越了知识的知识。”

学生们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想法让欧阳宏伟很欣慰，那些闪光的句子他都一一划了线。文章空白处，他和同学们交流起了体会：“挺好，要不断加强这种自我超越的惊喜感、幸福感，从而越来越强！”“超越了知识的知识，在我看来就是创造知识的方法。”“大学之‘大’：我的理解是，人有两个肩膀——承担责任。人的存在感和幸福感来自于‘被需要’。保送入大学后的放松和随意并没有带来幸福感，反倒是‘安以若失’的感觉，要立足于被社会家庭需要，解决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就会认识到自己积极自修的学习的重要。”

魔鬼训练——不知不觉中站在新的高度

“和风细雨”并不是导师工作的全部。同学们发现，他们也有“被逼得很紧”的时候。

“生命科学基础”是大一就开设的专业课。同学们拿到教材时发现，这是一本全英文教材，由坎贝尔、瑞斯和西蒙主编的《生物学导论》的最新版，一本国际公认的最好的教材。

“用最好的教材、最新的版本来上课，是我们教学方案的要求。”欧阳宏伟说，“根据一门课里不同的内容，我们也会跨学院、学校聘请相关的老师来给学生授课。”同时，课堂上，老师主讲之外，大量增加了课堂讨论和学生答辩的环节。在这种模式下上好一门课，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难度都加大了。

李颖聪也是生物医学班的学生，进校后她经历了第一次看似很简单的课外阅读。“第一次讨论之前，老师发给我们一篇刚发表不久的英语原版论文，要弄懂其中全新的概念，就要去找其他很多材料来看。读懂这篇论文，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李颖聪说：“这样的学习方式虽然适应起来很花费功夫，但是回过头来看，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自湖北黄冈的小成说，自己正是在“魔鬼训练”中走向成熟，学到方法，找到方向。

4 月 1 日起，同学们就分别去基础医学院的 5 个研究中心的实验室，跟着教授和研究生们“轮转见习”。这也是生物医学专业的“规定动作”。学院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见习早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等大二一开始，每位学生就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专业导师，而专业导师的责任是负责学生专业科研能力的提升。

欧阳宏伟说：“要提高我们国家的基础医学研究水平，需要大量潜心科学的人才。虽然目前我

们才起步，还只有一个班，但我们希望探索出一种新的方法，培养真正热爱医学研究的人。”

【院长点评】

导而不堵 引而不驻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 陆国栋

大学与中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大学只是上的课更多更杂？只是班主任和家长不再紧紧盯住你？只是这两节课与下两节课教室教师往往都不同？我想这都是外在的。

其实，大学的课本来可以不要那么多，如果我们提升每门课的质量，我们的老师很好地引导，我们的学生自主地投入。大学，除了大楼更有大师，如果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我们的学生主动去找老师，我们的老师经常去找学生，老师特别乐于付出。师生，应该关注课程，但课内的空间是有限的，而课外的空间是无限的。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专业的师生共同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一组导师围绕在学生的身边，导而不堵，引而不驻。当你需要时，你随时能得到他们的指点。时时刻刻，你总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一组学生围绕在导师周围，教学相长，生生互动。

我们的学生经过 12 年基础教育的风风雨雨，与国外的大学生有较大的不同，我们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否则的话，我们的学生不适应、我们的老师不习惯、我们的资源也不够，或许这正是设立试点学院的缘由之一。我们的学生是有潜力的，“给点阳光就灿烂”，就看我们如何引导思维、启迪心扉、激发兴趣。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师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老师投入更多，学生投入也更多，更有兴趣，既挖掘了课内空间，更拓展了课外空间。这样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3 年 04 月 15 日

上海交大与全球名校合作共建免费“移动课堂”

上海交通大学 16 日宣布其“南洋学堂”网络视频公开课 (<http://ocw.sjtu.edu.cn>) 正式上线。首批 42 门课程将与全球 48 个国家地区的 200 多所大学的课程一起，出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开放课程资源联盟中。人们通过电脑、手机等媒介，即可由此聆听名师授课。

上海交大副校长黄震 16 日在发布会上表示，跨时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已使知识获取的

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教与学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和地点条件的限制，知识获取渠道灵活与多样化，这对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也是一种挑战。网络在线课程也在从过去的辅助性课程逐渐变成学校的主流课程。

“有人预言，大学不改革可能会沦落为一流大学的教学实验室和辅导教室。”黄震表示，需要重视网络课程引发的全球教育资源配置对中国基础和高等教育的影响与挑战。

据悉，2005 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牵头，全球 100 多家教育机构参与的开放课程资源联盟建立，旨在促进全球教育资源共享。目前，加入该联盟的有 48 个国家或地区的 200 多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是大陆首个加入该联盟的高校。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3 年 04 月 16 日

北京工商大学：招生与就业对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4 月 11 日，在教育部 2013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结束第二天，北京工商大学专门召开招生就业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把招生和就业对接起来，深入分析生源录取、就业市场传递的多重信号，据此强化人才培养的教学和学科专业，大力推进学校正在实施的学科质量提升计划和本科教学综合改革。

招生和就业相辅相成，关乎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招生就业和学科建设、教学改革息息相关，需要协调一致发展，这是北京工商大学党政领导和招生就业、教学科研部门的一致看法。在北京工商大学校长谭向勇、副书记卢思锋的讲话和研究生处、教务处、学生处的专题报告中，生源质量、市场信号、市场需求、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等词汇频频被提起。

高质量的生源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质“原材料”，是高质量就业的基础。无论是研究生招生，还是本科生招生，北京工商大学都坚持高标准，保证质量，宁缺毋滥，在招生宣传内容中，加大学科专业比重，突出学校特色和比较优势；在招生指标分配上，以学科专业建设水平为导向，促使学院找定位，突特色，练内功。

毕业生就业质量是学校人才培养水平的试金石，而市场传递的信号又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有着深刻影响。“出口”畅不畅，取决于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强不强，而这与“生产过程”好不好和“核心支柱”硬不硬密不可分。据了解，北京工商大学从 2011 年 11 月启动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课程改革为核心、以考试改革为抓手、以质量监控为重点的本科教学综合改革，在金融工程、自动化、

法学、会计学、食品质量与安全、英语等 6 个专业试点的基础上，从今年 9 月在全校全面推进本科教学综合改革。今年 3 月，学校又启动学科质量提升计划，提出以学科建设为龙头配置资源，要求各院系按照学校学科建设的总体思路，梳理现有的学科专业，科学定位，凝练特色，从学科方向、学科层次、学科团队、学科基地及建设机制等方面绘制学科蓝图规划。

谭向勇表示，影响招生就业工作水平有若干因素，其中学科专业作为主要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高校发展的核心是学科建设，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才；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生产过程”，本科教学综合改革有助于提升教学水平，最终目的仍是培养人才。在招生、就业已基本成为常量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市场信号在教育教学各环节中的作用，推进学科建设，推动本科教学综合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进而带动招生就业质量提高。

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3 年 04 月 15 日

● 国外高教

改变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 5 个趋势

中国驻英国使馆教育处 蔡弘 王焕现

《泰晤士高等教育周刊》近期刊登了题为《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文章，探索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的 5 个趋势。该文作者伊丽莎白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周刊》负责科研的撰稿人，并主要负责研究生教育、早期职业发展研究、知识转化、计算机和医疗研究等。

趋势一：本科教育需求崛起

在过去 10 年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剧增。在 2000 至 2010 年间，世界范围内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从 19% 增至 29%，并且该趋势会保持下去。到 2050 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将达到 2.62 亿人，2010 年则只有 1.78 亿人。这种增长的来源将会改变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但是，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两个国家所产生的：中国和印度。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增长的主要部分，如斯里兰卡。

然而，除了少数富裕的小国家，任何国家高等教育的扩张都会导致教育质量和毕业生质量的下滑以及顶级大学和末位大学之间差距的扩大。远程教育也许是解决本科教育需求增长的办法。但是即使在远程教育中，仍然需要一些“面对面的接触”，故混合型的传统教学和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值得探讨。

趋势二：私立教育机构增多

高等教育领域需求的增长大大增加了私立教育机构的数量。在过去 20 年间，拉丁美洲高等教育已经从公立教育为主体转化为私立教育为主体。这个现象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亚洲。在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私立院校占主导地位，但没有人真的关心其教学质量。

一些大型企业如培生和微软都已经开始在开发课程和提供后台支持上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但是，现有公立学校的敌意和古板会阻碍私立院校的发展。几个大的美国营利性公司，如阿波罗集团已经开始海外扩张，包括建立校园，购买现有学校，开发并销售其网络教育资源等。

趋势三：学生或其家庭承担更多学费

随着学生数量的增长和一些国家预算的紧缩，高等教育学费转由私人支付。在 2000 至 2009 年间，私人支付的高等教育学费增长了 7%，其中最主要的增长来自于学生自付学费。芬兰和匈牙利分别在 2010 年和 2013 年引入或将引入学费机制，而英国则大幅增长了学费。美国则在 2011 年达

到了 25 年来最少的政府投入，导致学生学费在 2010 至 2011 学年比 2000 至 2001 学年增幅达到 42%。学费增加所产生的影响在国与国之间会有不同，但共同点是都会要求教育更加透明，要求提供的教育更为可靠、更关心教育所带来的回报和收益。

趋势四：新区域的崛起激励全球竞争

全球范围内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剧增，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和这些国家对于科研的巨大投入以及政府想要建设世界级研究型大学不无关系。亚洲尤其在科研上投入巨大，并且，中国、新加坡、韩国、巴西最近已经开始收获科研投入的成果。印度总统在其新年致辞中也许诺要使印度在 2020 年成为世界前 5 名的科技强国。

趋势五：国际化更为广阔和深入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交通和通讯手段的进一步提高，每个国家都在推动自己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国际流动学生在 2025 年将可能达到 800 万人。但是，由于主要生源输出国如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约旦正在力争成为留学目的国，流动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巴西政府为迅速提高国家科技水平，今年开始实施“科学无国界计划”，资助 10 万多名愿意学成回国的学生海外留学。

同时，过去的 10 年间，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办了国际课程、联合培养课程和海外校园。卡塔尔、新加坡、阿联酋和中国都将促进国际化列入其国家政策中。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3 年 4 月 19 日

美国大学生的学贷“必修课”

又逢美国大学录取季，年轻学子们在憧憬大学时代的同时也不妨看看凯莉·斯佩思的募款网页“20 万美元”。这个快满三岁的网页上，右侧鲜明标注筹款总额“12989 美元”。

当斯佩思 2009 年拿到美国东北大学一纸文凭时，也正式踏上了偿还 20 万美元学生贷款的漫漫长征路。“我盼望着展开新生活，还清债务，然后学以致用！”她索性将朋友间的一番笑谈化为行动，开设网页向好心人寻求帮助。少则几美元，多则上百美元，捐款断断续续。

别以为凯莉是一个懒姑娘。她整个大学期间都坚持打工赚学费，毕业后还在全职工作之外常做兼职增加收入。

去年 9 月，网友布莱特一下捐了 400 美元。同月，斯佩思也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与同伴创立了新网站帮其他受困学子吸纳来自校友和社会的资助。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你不是一个人在负债！”

斯佩思希望通过筹款网页让更多年轻学子及家长警惕误陷学贷泥潭，呼吁全社会意识到学生贷款所引发的各类问题。

在美国学贷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斯佩思的行动无疑引起很多共鸣。不少年轻人兴起“网上求助”的念头，留言求斯佩思支招。斯佩思在网页上调侃道，或许应鼓励年轻人把大学要读的4年时间花在每天8小时上图书馆自学更“划算”。

高等教育还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吗？尽管美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世界一流，但越来越多不太富裕的美国家庭正对其投资回报产生犹疑。

去年连任竞选途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常提及自己和妻子米歇尔毕业后成“负翁”，直到8年前才彻底还清学生贷款，以示与广大学子“感同身受”。不过，比起奥巴马一代，今天的美国年轻人学费更贵、贷款负担更重和违约率上升已是不争事实。

在美国经济和就业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削减教育拨款，高校学费近年来节节攀升，大学生及其家庭负担日益加重。据美国大专院校委员会数据，2011至2012学年，美国四年制公立大学人均学杂费为8244美元，比上一学年增加8.3%。

美国学生贷款债务2011年底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信用卡欠款而跃居美国人债务首位。其中，由联邦政府资助或担保的助学贷款额达8640亿美元，商业学生贷款为1500亿美元。

美国信贷机构今年3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今年前两个月，金融机构对学生贷款销账达30亿美元。

去年《新闻周刊》曾发布一项“2012年最难负担高校排名”。康涅狄格州的圣心大学排名第一，平均学费约5万美元，99%毕业生须偿还学生贷款。

另据统计，近年来，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中高达一成人每月均偿还学生贷款额度超过其工资的25%。

更令人担忧的是，学贷之负还可能对年青一代心理乃至生活方式产生长期影响。

去年推出的美剧《破产姐妹》讲述了两个经济破产的姑娘努力打工摆脱困境并追寻个人梦想的故事。主角之一马克斯颇有厨艺天赋，个人财务状况却是一团乱麻，原因之一就是利滚利形成大雪球的学生贷款。剧中，她面对讨债公司如惊弓之鸟，恐怕也是部分美国年轻人内心真实的写照。

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去年一项调查显示，年轻人就业率正触及60年新低。在18岁至34岁人群中，逾三分之一表示面对严峻就业形势，自己不得不继续深造、暂缓就业；大约四分之一暂时委身于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搬回父母家同住；20%受困于财务能力不得不推迟结婚或生子。

奥巴马政府去年此时正高调地推动为学生减负，国会也在最后关头同意延长一项政府补贴学生贷款的低利率。但没了竞选政治的需求，低利率眼看今年7月1日又要到期，一度火热的话题今年却遇冷。不少新生在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中恐怕都逃不开学贷这门“必修课”。

来源： 新华网 2013 年 04 月 12 日

法国“未来教师”职业助学计划鼓励大学生任教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侯鹏生

为解决法国中小学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法国近期推出了一项名为“未来教师”的职业助学计划，鼓励在校大学生选择教师作为职业。

具体而言，自 2013 年到 2015 年，教育部将为 18000 名有志于成为教师的大学生提供资助，帮助他们顺利入职和积极融入社会，进而实现“促进教育改革”和“优先关注青年发展”的双重目标。

目前，法国中小学教师的培养由公立大学教师培训学院承担，其主要任务是传授专业知识和安排学生实习，并组织学生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教育部的这项助学计划明确规定：所有大学一年级以上、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学生（残疾学生年龄可放宽到 30 岁）都可以申请该资助，通过者在教师培训学院继续学习。该资助平均每月为 217 欧元，如果加上实习期间平均 400 欧元的工资和其他各类奖学金和助学金，有意成为中小学教师的法国大学生每月最多可获得 1086 欧元的收入。

在欧盟各国经济普遍面临严重问题的社会环境下，这项资助的效果非常明显，对帮助青年顺利完成学业大有裨益。

助学计划不仅在经济方面提供资助，更针对新入职学生的实际困难设计了灵活实用的教学实习。首先，助学计划要求学生实习期间每周工作 12 小时，但具体实施方案可“根据学生的课程、考试情况进行调整”，以“最终通过资格考试”为目的。其次，每个实习学生都将拥有一位专门的指导老师，“全程跟随其逐步深入教师职业”，以期尽快提高新入职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

计划还规定，以下 3 类学生在申请资助时将被优先考虑：在社会问题集中的城市敏感区居住两年以上的学生，在此类地区的中学学习满两年的学生和法国海外领地居住满两年的学生。这表明，助学计划的推出不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大学生加入教师队伍，对于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来说，该计划还带有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深层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法国新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不断。这既是当前法国推进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法国政府赢得民心、以便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手段。

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13 年 04 月 12 日

联合国发布 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4 日发布 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改变当今世界发展格局并推动全球“再平衡”，同时呼吁扩大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权。

这份题为《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的报告说，“南方的崛起在速度和规模上均史无前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人口的生活条件及其未来前景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中国和印度在不到 20 年时间里将人均产出翻了一番，这一转变所惠及的人数约为工业革命时的 100 倍。

报告说，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已提前三年实现，主要是因为几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功，巴西、中国和印度三国均显著降低了其贫困人口的比例。

报告说，在发展中国家中，仅巴西、中国、印度这三大领先经济体的经济总产出便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这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相当，这是 150 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表明全球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再平衡。报告预测，到 2050 年，巴西、中国、印度三国的经济总产出将占到全球经济总产出的 40%，远远超过七国集团的经济总产出。

报告说，截至 2011 年，国际贸易额已占到世界经济总产出的近五分之三，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 到 2010 年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从 25% 增至 47%，在世界经济总产出中所占份额从 33% 增至 45%。

报告说，最不发达国家能从南南贸易、投资以及资金和技术转让中享受到更多利益，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增长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达国家日渐萎缩的需求。报告还说，南方的崛起涵盖一系列国家的广泛经验，并向世界表明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和维持人类发展。

报告提出应重新审视和调整当前国际治理机制和原则，在国际治理体系中更多地体现南方国家的利益，扩大它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但报告也强调：“南方国家需要北方国家，但北方国家也越来越离不开南方国家。”

自 1990 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会独立编辑出版全球人类发展报告，对人类发展的主要问题、趋势和政策进行独立并基于实证的分析。

来源：新华网 2013 年 03 月 15 日

● 校长著述

耶鲁校长谈中国大学：中国学生大多擅长某一领域

耶鲁校长理查德 莱文昨在杭谈中国大学——

未来 10 至 20 年，中国会产生世界一流大学

这两天，美国名校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 莱文在杭州，他是来浙江大学参加“中国-耶鲁大学领导高级研讨班”。

昨天，他与耶鲁大学副校长罗琳达接受媒体采访。

谈及中国的大学，副校长罗琳达非常看好：“我相信，在未来 10-20 年，中国会产生世界一流的大学。”

用“无用性”的通识教育替代功利教育

在耶鲁，“有用性”的功利教育被摒弃。

副校长罗琳达认为，“有用性的教育，只专注于某一专业的教育，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其实，早在 1828 年的《耶鲁报告》中就提及，“学生获得某一专业的知识，就像脑子里装进了一件物品，但这种填充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当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

“无用性”的通识教育，被重视。“在美国，一流大学更重视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跨学科的教育。”校长莱文表示。这样，他们既能欣赏丰富的人文艺术，又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一般而言，美国学生在前两年可以自由并广泛地选择学科，后两年再挑选专业进行学习。前两年的通识教育过程中，“赋予学生更广阔的视野，培养他们批判性的思维。同时，这也是培养学生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和公民意识。”莱文说。

相较专业知识，“学生更需要的是思考的框架，让他们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流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其实，在耶鲁，“学生的压力也不小。”莱文笑着说。不过，他们用功地学习，同时也尽兴地玩耍。耶鲁的学生们，能在 300 多个学生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的领导作用。

一流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扩大他们的视野。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培养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

自 1854 年，中国首位赴美留学生容闳从耶鲁毕业后至今，赴美留学生的人数在不断攀升。但是，莱文发现，“中国学生大多非常关注或是擅长某一领域。”

他建议，“不妨大胆地去尝试新的领域，拓展你的视野。理科好的学生，可以多选音乐、艺术或是艺术方面的课程。文科好的学生，我建议他们选修科学方面的课程，不用害怕。说不定，在接触中，你会发现新的发展可能性。”

谈及中国大学，副校长罗琳达说，“32 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参观大学。32 年间，中国高校的发展非常迅速，这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她相信，“在未来 10-20 年，中国会产生世界一流的大学。”

校长的职能是“找人”和“找钱”

“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是找人和找钱。”莱文曾经这样定义“校长”。

吸引优秀的学生，需要优秀的师资。在耶鲁，就有这样一支团队在运作。

“今天早上，他还在打国际长途电话给一位教授，他在全球排名前五名，我们希望他能加入耶鲁。”莱文笑着说。

而一名好的校长，又该具备怎样的能力？“必须具有影响力和领导力。”他说。

具体来说，就是：制订引领大学前进的美好远景并能够将其准确传达；制订远大而且能够实现的目标。同时，具有变革精神、冒险精神和权力意志。

其实，莱文“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校长，“有时是学生，有时是教员。”只要莱文有空，他就会在校园逛逛，与学生聚餐，或是与学生一起打球。

每天晚上，他会与《耶鲁日报》（耶鲁学生自己创办的报纸）的学生沟通。“听他们的想法，回答他们的问题。”莱文说。

来源：今日早报 2013 年 04 月 19 日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多管齐下，促内涵式发展

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必须要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特别是人才培养，这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和首要职责，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

2012 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提高到了 30%，预计到 202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4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在此情况下，党和国家审时度势，提出高等教育要走以质量提

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高校自身努力，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高校人才培养要做三大工作

对于高校而言，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必须要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特别是人才培养，这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和首要职责，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目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切实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趋势愈加明显。在新形势下，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是提高大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要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深入推进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加强创新意识培养和实践技能训练，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最后，还要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20 多年来，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正在持续下降，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培养合格人才，身体是基础。要进一步加强体育工作，引导大学生科学锻炼、增强体质；同时，要加强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帮助大学生提升心理素质。

政府、社会须做好配套支持

从政府来看，政策和资金支持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强大推动力。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政策措施，如“211 工程”、“985 工程”、“2011 计划”、“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等，特别是 2012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4%，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我们相信，随着国家有关政策的持续推进和落实，教育经费的持续投入和增长，一定能够促进高等教育不断强化内涵、尽快提升质量。

从社会来讲，要积极为高等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譬如完善依法治校法律体系，保护学校合法权益；加强舆论引导，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正确看待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鼓励社会各界参与高等教育发展，在资金、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与高校加强合作，为大学生提供更多实践基地等。

创新平台项目应兼顾地方高校

就郑州大学所在的河南省而言，近几年，河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国内高等教育先进地区相比，还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太小。2012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

育本专科在校生 2391.3 万人，河南为 155.9 万人，占全国的 6.5%；2012 年全国在校研究生 172 万人，河南仅 3.2 万人，占全国的 1.86%，这与河南高等教育总规模极不相称。另外，河南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水平也不高。全国 912 个二级重点（培育）学科中，河南仅有 8 个；287 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河南仅有 1 个。而在科研创新能力方面，河南省内高校也存在一定差距。

为此，我们希望教育部继续增加河南高校研究生招生计划，扩大河南研究生培养规模，优化河南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适应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同时，相关部门也应结合《中原经济区规划》的实施，在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的布局方面给予河南倾斜，促进河南高校集聚和培养一批科研创新团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此外，2012 年底，教育部、财政部正式实施了“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作，在没有部属高校的 13 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重点建设一所地方高水平大学，中央财政进行专项支持。

与此同时，为提升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国家从 1998 年开始，实施以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985 工程”。近年来，教育部、财政部扩大了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支持范围，但 14 所“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入选学校尚无一承担“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从 14 所高校的情况看，一些学科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优势和特色，基本具备了建设“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条件。

为此，我建议教育部、财政部结合“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实施，在郑州大学等地方高校选择符合条件的学科设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作为增强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推动河南高校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4-18

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协同创新促高校三位一体发展

不同层次的高校在创新链上也应有不同的定位。在创新链上，如果企业前移，高校的定位也应当前移，即要把自身所承担的任务集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

2012 年 8 月，北京科技大学和东北大学牵头培育了国内首个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对于“2011 计划”的平台建设和实施细节，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有自己深入全面的思考。

在他看来：“2011 计划”对于今后进一步发挥高校作用、提升高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的质量是‘大质量观’，包括育人的质量、科学研究的质量、社会服务的质量等。通过协同创新，可以

达到这三位一体的综合发展。”

产学研的更高级形式

“2011 计划”是产学研活动中的一种，产学研相结合是协同创新的一种模式。”

产学研合作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指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之间的合作。丁烈云将目前高校产学研合作总结为几种模式：项目驱动型、地方政府驱动型、校企共建研发中心驱动型以及以共同培养专门人才驱动的产学研。他认为，“2011 计划”是在总结吸收传统的产学研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协同创新活动，或者说是产学研的高级形式，两者既具有相关性又具有差异性。

丁烈云进一步解释：“传统的产学研活动往往集中在某一成果、某一应用或者某一技术，学科分布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在合作对象的层次、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2011 计划’则涉及到创新链的上、中、下游，既有原始理论创新，又有应用创新，更有成果转化创新，涉及到创新过程的方方面面，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2011 计划”是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针对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重点行业而开展的协同创新实践，成果更注重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传统的产学研一般只是围绕企业生产亟须解决的技术问题和亟须培养的专门人才来开展合作。

除此之外，传统产学研多数集中在企业内部的某一关键环节以及高校的某些学科，较为封闭，开放性不足。“2011 计划”旨在提高高等学校创新能力，采取开放的组织形式，丁烈云认为：“在学科构成上将远远高于现今高校倡导的团队模式，在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同时，还紧密结合人才培养，实行科教结合，为更好解决当前高校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提供了良好途径。”

发挥好协同体的协同机制

作为继“985 工程”、“211 工程”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又一以国家意志推行的战略性计划，丁烈云认为，实施“2011 计划”必须高起点、高水平、有特色，其定位也应当围绕“国家急需、世界一流”来确定，“在组织上必须是强强联合，包括校校强强联合，校企强强联合，校所强强联合等”。

而如何真正实现强强联合，值得深入思考和设计。丁烈云介绍道，在东北大学等高校、院所、企业共同成立的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组建过程中，对这种强强联合的协同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强强联合的各方均须有大局意识。”协同方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以提升领域、国际竞争力为统一目标。各方还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感，求大同存小异，勇于担起共同的责任。

其次，协同体之间要实现优势互补。在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组建过程中，东北大学主要

优势侧重于钢铁生产工艺与装备，而北京科技大学则偏向钢铁材料与品种。“两者之间一方面涉及的是行业共性技术升级的定位，一方面则是产品结构调整的定位，两者区别明显且各有优势，强强联合自然就能形成优势互补。”

而在组织策略方面，丁烈云认为强强联合的模式有多种，责任主体的设置不一定明确到具体单位，可以根据创新中心的需求，直接明确到人，“在构成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管理机构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强化负责人的责任。在权责明晰的情况下，协同创新中心的构建就不会再受到申报单位的约束，组织形式也更为明晰”。

推动创新人才培养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在解读“2011 计划”时表示：“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其中人才是根本。”

“2011 计划”推进了创新活动和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在丁烈云看来，这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依托协同创新基地或者中心进行创新人才培养，既可以继续沿用产学研相结合培养人才的多种形式，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特殊的人才培养模式。

回顾历史，作为有着爱国主义传统的高校，东北大学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紧密相连，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丁烈云向记者总结道：“东北大学的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为特色鲜明的工科强校，东北大学一直注重产学研活动，综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直是东北大学的办学特色。

十多年来，产学研合作已经成为东北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学校选拔优秀学子到企业实习，与研究院所共育人才。谈起具体的举措，丁烈云如数家珍：提前选拔优秀本科生成为宝钢“青苹果”团队成员；与钢企联合探索“4+1”、“2+1”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宝钢、首钢设立研究生院分院；与钢铁研究总院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共办“本硕博贯通英才”实验班等等。

而此次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正是进一步拓宽了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丁烈云向记者介绍：“创新中心一方面采取特区式招生吸引优质生源，根据研发需要按需单独设立指标，提高津贴标准，形成良好的创新性人才的育人氛围；此外，进一步寓教于研，加强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院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中心覆盖的高校联合招生，单独设置创新课程，共同成立实验班，跨校、跨学科、跨专业选课，实现学分互认。”

“在校企合作方面，实行双导师制，提升工程硕士、工程博士的培养质量；实施订单式培养，按企业需求设立专业方向明确的研究生班，培养钢铁工业的现场工程师。”而校院合作方面，则建

立委托院所共同培养研究生的机制，并进一步扩大合作共办“本硕博贯通英才”实验班的规模。

“依托协同创新中心而采取的一系列创新人才培养举措，全面形成了科教结合的良好局面，也必将整体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水平。”丁烈云说道。

准确把握高校与企业在创新链中的定位

众所周知，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一直到产品投入市场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创新链。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在整个创新链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以 2009 年公布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单来看，已建成研究中心 144 个，依托企业设立 47 个，占 32.6%；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设立 97 个，占 67.4%。在建的研究中心 88 个，依托企业设立 43 个，占 48.9%；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设立 45 个，占 51.1%。

国际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或企业，均有非常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工作集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但在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较弱，许多技术创新工作大都依赖高校和科研院所。因此，丁烈云认为，研发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在创新链的定位需要前移，研发能力比较弱的企业在创新链的定位就要后移。例如宝钢集团的研究院，其研发能力比较强，所以宝钢在创新链上的定位就发生了前移，替代了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原来所承担的研发任务。

“此外，不同层次的高校在创新链上也应有不同的定位。”丁烈云说，“在创新链上，如果企业前移，高校的定位也应当前移，即要把自身所承担的任务集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就是如此。”

反之，像建筑业等研发能力比较弱的行业，就必然在创新链上发生后移，而高校的定位也相应地要进行后移，使得高校更有机会发挥自身的研发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在高校准确定位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做好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创新链上的主动对接。

从普遍规律上看，企业在创新链上的创新活动将会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前移，尽管高校科技创新活动可以直接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直接面向技术的开发、中试乃至标准的制定，但高校的核心任务必将回归原始角色。只有在创新链中把高校自身定位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原创性技术开发和共性技术开发，才能做到创新与学术的统一。

因此，丁烈云认为，实施“2011 计划”，打通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高校及科研院所为技术依托的完整创新链条；明确了高校服务企业攻克行业共性技术和企业关键技术，为企业提供科技支撑的角色；实现了技术和市场的有效衔接，创新活动和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建设的有机结合，“从而直接解决了我国的原创性不足问题，更解决了高校与企业的对接问题”。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4-18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

大学创新活力应得到释放

“三个脱节”，让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科技与教育之间的脱节。中国有 210 万名工程师，大学生中有 37.6% 的学生学工科，“现役”和“后备”工程师的数量目前都排名世界第一。但是，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 WEF）最新发布的“2012-2013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用度”指标中，仅排名第 46 位。由于人才链与科研链、产业链的脱节现象严重，学生在高层次科研和高水平企业中开阔眼界和实战锻炼的机会不多，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明显不足。

二是科技与经济之间的脱节。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70%-80%，而我国仅为 31.6%。2010 年起 SCI 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排在世界第 1 位，但我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也就是被引用次数居于前 1% 的论文（即“高被引论文”）数量仅居世界第 6 位。2011 年中国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但科技成果闲置和科技资源浪费等现象严重，整体转化率低于 20%，产业化不到 5%。

三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脱节。长期以来，我国基于学科的知识体系，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实行专业细化，造成一些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基于学科的研究体系，以国家学科目录作为大学学术机构设置的依据，形成院、系的基本形态，学科的作用被固化和行政化。基于学科的科教体制，使很多交叉学科的人才、项目、创新团队等评选找不到归属。在过于单一、急功近利的评价体系作用下，学科间形成了壁垒，不利于学科交叉，使大学多学科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面向现代科学前沿领域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受到限制，创新的根基不够坚实，后劲明显不足。同时，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脱节，不利于学科链与产业链的高效、完整对接。

要在解决“三个脱节”上实现突破，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教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转变大学发展方式，推动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充分释放大学的创新活力。

1. 优势与定力

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蕴藏着无穷的创新潜力。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在推进“四化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既有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更有发达国家从来没有遇到也不可能遇到的重大、前沿问题。率先解决中国遇到的复杂问题，必然会对解决世界发展的共性问题具有引领性，这是中国大

学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在的核心竞争力。但我们缺少引领的自信，缺少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的定力，实践中还容易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创建世界一流简单对立起来，认为服务国家战略只是“权宜之计”，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正业”。

美国哈佛大学转化医学中心主任告诉我：过去几十年生命医学科学发展非常快，而临床医学几乎没有太大发展。他认为论文导向的评价体系阻碍了临床技术的发展。他还进一步反思：大学的自由探索与集成创新如何平衡？他说，美国一个个教授、副教授都是独立体，太强调个体化，不适应大科学时代的团队创新。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团队模式值得学习。这同样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在科研组织模式上，我们不能一味的学习欧美个体自由探索模式，而是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既注重为教授自由探索创造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又要强调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发挥好大团队的作用，要努力探索出自己的道路。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今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NSF）在项目中对负责人的资格条件作了调整，过去要提供 10 篇论文或著作（Publications）；现在调整为提供 10 项成果（Products），既可以是论文或著作，也可以是数据集、软件、专利、版权等，同时还看重这些成果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做法，我们要积极学习借鉴，但发达国家的创新模式也在与时俱进，我们不能满足于跟踪模仿，而是更要有创造力、定力和自信，更好地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凝练出中国的经验。

2.体制与机制

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技术转移的体制机制。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简称 AUTM）对 300 多所大学会员进行调研统计，2010 年度 AUTM 大学共获专利授权 4469 件，专利转让许可 4284 件，专利许可收入达 24 亿美元。相比之下，2010 年 AUTM 大学专利授权数只有我国大学专利授权数的 1/8；但是其转让许可数却是中国大学的 2.4 倍，专利许可收入更是我们的 45 倍。即使这样，美国仍在反思，准备拿出 10 多亿美元，在大学周边建立一批制造转化工程，填补大学和企业间的沟壑。我们更应该深刻反思我国大学的知识产权法规和专利政策，不能为了追求数量，为了专利而申请专利，不能用宝贵的资源去维护那些没有转让价值的专利，人为制造创新的泡沫。而是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去保护那些有转化价值的专利，并且要努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学科交叉的体制机制。从科学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看，在单学科体制模式下，重大原创性的工作似乎愈来愈难以产生，以解决复杂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研究是大趋势。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一直在致力于原有单学科科研和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变化就是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知识分类，鼓励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合作。

目前，我国对交叉学科研究的支持有了长足进步，“973”计划设有综合交叉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遴选出 13 个综合交叉的优先领域。但在国家顶层设计、评价体系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

3.价值与文化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现在产学研合作越来越难了，企业认为，找大学合作，最好的结果就是一方交钱一方交技术，“一拍两散”；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或卷走技术，留下很大“后遗症”。大学则认为，产学研合作对于提升学术价值没有太大帮助，而技术转移到企业后又很难在利益上得到保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急需培育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文化，双方的价值追求要找到结合点。

去年 7 月 15 日，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大型铸锻件研制成功，中国核电装备制造“最难拼图”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完成。这是国家高端装备制造和能源战略的核心技术，是上海高端制造必须攀登的高峰，曾是卡在中国核电装备业咽喉中的骨鲠，以前上重厂多少次试验都没有成功。要解决这个世界级难题，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根本不可能攻克。上海交大潘院士主动向上重厂讨项目，并提出“这个项目立不上一个课题、拿不到一分钱也要做！”合作之初，双方跟着项目走，还要签订保密协议；随着合作深入，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目标瞄准长远，再不需要为了具体项目签合同。潘院士带领的十几位教师加盟后，基础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的巨大优势充分显现。今天，不仅大项目研制成功，而且，上海交大科研团队从大锻件生产工艺中归纳提炼出基础理论问题，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学生。迄今已发表高水平论文 100 余篇，并从这个产学研合作中衍生出“973”计划项目。这充分说明，只要以诚相待，真诚合作，在大学引领行业发展的学术导向和企业面向未来竞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导向之间，完全可以找到价值和利益的共同点。

来源：光明日报 2013 年 04 月 08 日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

把握协同创新实质 推动高校科学发展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对加强协同创新做出了战略部署。大学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高校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贡献。科技自主创新，从内容上看，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组织形式看，则包括协同创新和非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不同创新主体联合展开的创新活动，而非协同创新则是不同创新主体分别独立完成的创新活动。协同创新已成为现代科技自主创新最重要的、

也是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协同创新作为创新的一种组织形式，涉及到观念、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并且应以观念的创新为前提，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证。只有把握好协同创新的实质，才能更好推动高校的健康科学发展。

一、观念创新是协同创新的前提

观念创新是协同创新的前提。在“2011 计划”的实施中，要使协同创新迈出实质步伐，朝正确目标推进，并产出实际成果，首先需要的是观念创新，强化以下五种意识：

以学术为定向，做到坚守学术强根固本。以学术为定向，是大学自身存在的内在要求，为了大学，学术必须存在。大学的创新，其中学术创新是应有之义。“2011 计划”强调以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为核心任务，其中，人才是根本，学科是基础，科研是支撑。作为学术的集中体现，科学研究是协同创新价值链条上的主线，串联起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资源整合等环节。因此，必须首先强化学术意识，倡导学术立校、学术强校，并且使之成为学校的共识。办大学必须要依靠一大批学者，要依靠大学者，学者的生命在于学术，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创新的活力与合力来自协同。学术只认道理，不顺从金钱、不盲从权威、不屈从权贵。学术贵在坚守，追求卓越，不能趋炎附势，不能随波逐流。

以需求为导向，做到“三个突出”。即突出战略性，研究与解决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突出前沿性，研究和解决科技尖端领域前沿性问题；突出公益性，研究与解决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期。作为知识和科技创新的载体，大学承担着重要的现实使命。“2011 计划”是我国“十二五”以来出台的首次以创新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工程，强调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目标和方向、标准和条件，要求高校围绕这三方面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协作，聚集一流的创新团队，创造一流的创新成果，培养一流的创新人才，形成一流的实力和优势。这就需要高校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以需求为导向，将研究的视角与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鼓励研究人员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注重成果的应用性、对策性，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和现实问题，承担起社会昌明的大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以开放为取向，做到高校在开放中促发展。既包括高校与高校间的相互开放，也包括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事业单位、民间社团、政府机构、国际创新力量间的开放。开放是协同创新的必然要求，“2011 计划”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问题牵涉面广，单一学校、部门、行业难以独自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学科、多行业、多部门共同参与，建立起开放协作的体系，开门办学，开门研究。这就要求协同创新体强化开放意识，强强携手、优势互补，既勇于担当主角，又乐于充当配角，既

主动去寻求被协同者，又主动去寻求协同者。开放的反面是封闭，必须打破思想的藩篱，条块的分割，部门利益的壁垒。由封闭走向开放，既需要智慧，又需要勇气；既需要积极的姿态，又需要包容的心态。当然，大学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开放，在协同创新的整个链条中，不同阶段不同主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因此，在校企协同创新过程中，开放的度必须把握好。这就要求大学既要面向需要和市场，却不能一味迎合需要，甚至走向市场。当然，虽然不直接成为市场的主体，大学仍然可以以间接的方式参与市场，比如说以知识产权的方式参与企业创新的技术支持，从而获得回报等等。

以融合为方向，做到多学科的融合。包括：产学研用的融合；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的融合，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多种资源的融合共享是“2011 计划”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协同创新应当融会贯通不同部门、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创新资源，集聚各种创新要素，打通创新资源包括人才、项目、成果、经费、硬件、信息等在不同单位之间的有序流动的渠道，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整合共享制度，减少资源的重复浪费和冗余损耗，实现对创新资源最大的开发、利用和增值，发挥协同创新对创新功能的扩大、放大、倍增作用，产生单一部门、学科、行业无法达到的集约效应。对于大学来说，在融合上做文章就是要依据不同学科特色，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新模式。关于学和研及其相互关系，我们过去强调得多，但对于产与学、研的结合却强调得不够。在推进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有三点显得特别重要：一是产学研结合中的产字不能和产业划等号，确切的说，它主要指大学教学科研产出的成果必须服务于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不但要有这种取向，而且要有这种能力。二是产学研结合，学和研是前提，在大学绝不可背离这一前提去搞所谓的产。目前，关于产学研结合的认识有三种偏颇：过多关注研与产的结合，相对忽视了学与产的结合；在研与产的结合上，过多关注自然科学之研，相对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之研；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多，关注为社会发展服务少，在为经济发展服务上，关注硬东西多，关注软东西少。三是产学研结合应分类指导，我们提倡因校制宜，提倡从每个大学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出发，并制定出合理的评价尺度和标准，绝不能搞一刀切。

以引领为指向，做到培育一批、带动整体。“2011 计划”是一种引导性的计划，旨在通过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促进高校科研环境、人才质量、学科水平的整体提升。这就要求，一方面，在各种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大科学背景下，高校应当破除单一学科、单一团体发展的陈旧观念，营造出“人人讲协同、个个讲创新”的整体氛围，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融入每个研究人员的思想，改革当前科研发展体制中与国际科学发展模式、趋势不相适应之处，以求实现重大领域、重大任务的突破。另一方面，高校组建的协同创新中心作为学术高地、研发基地、重要阵地和主力阵营，不但要能对

国家创新体系起支撑作用，还必须对所有高等院校或一所高校内的所有学科起示范作用，带动和辐射其他学科的发展。

二、体制机制创新是协同创新的保证

创新是一项长期的综合系统工程，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更要重视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推进协同创新、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现阶段，大力倡导制度创新则显得尤为迫切，包括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它们是协同创新的保证。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体制机制创新是重点，更是难点。

高校、政府、行业、企业之间通过强强联合，组建协同创新中心，人才、项目、资源等高度融合。如何使这些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能够发扬和放大优势，产生功能倍增效果，必须建立适合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从形式、内容、层级上全方位设计协同创新中心的制度模式和结构体系，使它能有效实现创新目标。

因此，协同创新是一种管理协同，不仅涉及原有管理制度的转移，而且要在协同体内实现管理制度、管理体系的新突破、新发展，并促进原协同单位管理体制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这也是“2011计划”实施的核心之处。高校要改革现有制度，突破各种对人才、学科、科研发展构成阻碍的藩篱，从组织管理、人事管理、人才培养、科研评价、科研组织、资源配置、国际合作交流、创新氛围等八方面进行机制体制创新，探索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创新理念落地、管理制度落地、贯彻执行落地，实现协同创新中心整体功能的溢出效应。

在这八大机制体制改革中，我们认为，最核心的两项是人事制度和科研评价制度。协同创新中心聚集了本领域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如果仍按照旧有人事制度进行管理，则无法将这些一流的学者聚集到一起，并开展协同工作。只有建立灵活多样的人员聘用、薪酬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既自主研究，又紧密合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要探索建立以重水平、重贡献为主的评价体系，完善短期考核与中长期考核并重的考核制度，必须摒弃重数量的片面考核方式，克服科研评价短视行为，解决好定期考核与长期评价的关系，鼓励潜心研究，产出重大成果。

推进人事制度和科研评价制度创新的前提基础在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办学自主权。比如在职称评审中，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只需进行宏观调控和分类指导即可，切实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充分信任高校有能力建立符合学校发展需要、社会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职称评审机制。在具体操作中，对具有职称自评权的高校，在抓好高级职称职数的审批和职称评审办法的备案，以及职称评审申诉的受理的基础上，具体的条件设置、资格审查、评委组成与抽取等环节上则可以由各高校自主。此外，推进人事制度和科研评价制度创新还需要切实给高校“减负”。当前，高校承担着一些本不应该由高校

承担的社会职能乃至行政职能，负担较重，需进一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减轻。有关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改革高等教育评价办法，改善科研评价制度，减少其中不必要的检查、评估，改进评估方法，加强日常监督，使高校能够集中精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多出创造性科研成果。

没有灵活的人事制度、没有激发科研活力的评价考核制度，所有的创新措施、制度将会成为一纸空文，看似美丽，却难以产生实效。体制机制创新，尤其是人事制度和科研考核评价制度的创新，一方面，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加以推动，在体制和政策项目引导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需要创新主体间的协商对话、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从点到面地推进。

三、地方高校在协同创新中承载的使命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实现着由规模扩张向全面提高质量的战略转变，如果我们把质量视为生命的话，那么创新能力就是生命的血脉。实施“2011 计划”，展开协同创新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对地方高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在其中承载重要使命

1. 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

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地方高水平大学已经初步形成了功能集中、特色鲜明、价值取向明确的发展定位，具备了良好的区域优势和学科优势，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成绩突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但随着高等教育向纵深发展，一些地方大学在发展定位上也出现了定位趋同、位置迷失的状况，长期形成的特色、优势日渐消失在对规模的追求之中。

“2011 计划”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直接体现。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地方高水平大学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牢固树立以需求为导向、贡献为宗旨、创新为主题、共享为手段的发展思路，通过紧密协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加快学校建设和学科建设步伐，坚持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来科学布局与规划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功能，将学校建设成为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的重要阵地，前沿科学知识的重要源头。

2. 进一步调整发展方式

在上一轮建设过程中，地方大学主要走的是外延式发展道路，表现出封闭性和分散性发展的弊端，导致创新资源分散、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并且科学研究与国家需求、人才培养结合不紧密，与现实需要严重脱节。高校与高校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资源重复，创新效率不高。而当今的科学发展时代是一个大科学的时代，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成就都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领域的相互

合作，集约、协作、互补、共享是大科学的典型特征。这种封闭式的发展方式只会让学校的创新能力越来越萎缩，使自己陷入创新价值链的低端，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科学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2011 计划”就是要打破这种分散、封闭发展方式，强调开放协作和互补共享，强调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协调发展。这就需要地方高水平大学转变发展理念和方式，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促进内部资源和外部创新力量的有机融合，提高科技资源、创新要素的使用效能，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成果共享、利益共赢的开放型协作机制，促进学校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向市场需求的上游、中游、下游每个节点联合、贯通，使自己能保持处于创新价值制造链的高端，全面提高人才、学科、科研的质量和水平。

3. 进一步利用创新平台做更大贡献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大学面临着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它们在政策环境、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仍受到相对限制。尽管一些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广泛争取、积极参与，但在很多方面仍受到发展约束，“高水平”也只是相对而言，在竞争中机会并不多。恰恰“2011 计划”给地方高水平大学提供了一个和其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同等发展和竞争的机遇。这个计划面向各类高等学校开放，不限定范围，不固化单位，不搞论资排辈，符合计划申报相关条件的高校均可参加。这就需要地方高水平大学对学校机制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注重联合攻关，激活创新基因，挖掘创新潜力，扩大交流合作，紧紧抓住创新能力建设这个根本，抓住出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这个关键，组建协同创新平台，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化机遇为地位，变参与为引领，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彰显地方大学的话语权。

因此，地方高水平大学应当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建立起全方位、全要素的协同创新机制体制，倡导以创新驱动学校发展，实现学校优势与社会重大需求的有效对接，切实发挥学校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2013 年第 06 期

● 专家视点

大学及其教授的使命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从“教士的村庄”到“知识人的城镇”，再到今天“多元化巨型知识都市”的大学究竟是什么？这是人们一直探索的对大学内在逻辑与外在使命的认识问题。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虽然还未达成明确的共识，但无论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中国式大学理念，还是“一流教师成就一流大学”的西方式大学理念，无不强调“大学之本在于大师”。梅贻琦曾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授与大学的使命具有同理性。大学及其教授的使命就是大学与教授在社会文明进步中所应担当的角色和责任。

近年来，大学精神的迷失和市场的诱逼使大学越来越功利化，大学教育的“技艺层面”得到最大化的表达，而“价值层面”则越来越被遮蔽。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原校长 R.M.哈钦斯的话来说，大学如果日益成为职业培训所，就将丧失“大学的理念”或大学之道，成为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与此同时，教授的学术活动名利化了，它可以换来金钱、住房、职称、官位、奖品、名声……学术的价值可以转化为市场价格。这种功利化的陷阱如同一剂强烈的腐蚀剂，正在腐蚀着大学及其教授的学术生命。

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哈罗德 珀金说，“大学是人类社会的动力站”。人们曾用“象牙塔”来比喻大学，皆因那时的大学摆脱了外界束缚与利益，专注于高深学问的探究；而今人们说，大学成为“社会动力站”，皆因今日的大学担负了社会责任。

从现代大学发展史来看，尽管大学已经走出了“象牙塔”，但大学的本质始终是探索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关怀终极价值、传承人类文明、提升人类精神、守护人类尊严；大学存在的核心价值依然是追求真理。可以说，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为目的，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并影响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的学术组织与教育机构。

教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是大学的资深教师。教授以教书育人为本，除了传授给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之外，还涉及另一重要方面，即培育学生的品德。美国教育家德怀特 艾伦说：“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此外，教授是学术创新的典范，是大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科学

真理的坚定实践者。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永远是由这所大学的教授来代表的，如果一所大学有一批既有大学问、又有崇高道德的教授，这所大学就会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大学。一个道德崇高的教授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基于庸俗的价值观，而是基于一种理想主义。

教授在大学承担着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工作，并通过这三项工作完成三大使命。首先，是历史的使命，即选择与传承人类优秀文化。古往今来，人类创造的文化浩如烟海，哪些是值得传承的优秀文化，需要教授秉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科学态度，选择反映社会进步的主流文化，以学术著作与教学的形式加以传承。其次，是现实的使命，即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新文化。教授应关注现实世界，从事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并对现实作深刻的反省和批判，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创造。再其次，是未来的使命，即为未来培养优秀人才。教授应该通过文化的选择、传承与创新，培养能够把未来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学生。这是教授首要的核心使命，如果舍此使命，就不能称其为教授。

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其自然特性，而在于其文化特性。大学教育要通过创造和传承人类文化，塑造学生的思想和灵魂，使其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文化人。为此，大学首先应该成为优秀文化的中流砥柱，尤其在国家与民族文化危难的时候，大学的坚守就显得尤为重要。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而“遗传”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文化的传承。大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上所有组织中最具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来自于大学对创造和传承人类优秀文化的自信与自尊。克拉克·科尔说：“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就是说，大学作为人类优秀文化创造和传承的人才培养机构，应该针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需求，实现优秀文化创造、传承和人才培养的使命，也会因此获得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信任与尊重。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3-4-19

中国大学，何时“世界一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祁祥

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既有知识体系的传授，更有创新能力的培养；既有学术的传承，更有新的突破；既有对探索的宽容，更有对真理的敬畏，那么，成为世界一流也只是时间问题。

梦是什么？梦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虚拟表达，是对美好事物的一种热切追求。做梦容易圆梦难。

圆梦需要条件、行动和付出。光做梦而不付诸行动，只会是南柯一梦。“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构成了中国梦的内核，都要靠扎扎实实的工作和成效来支撑。圆梦需要所有中国人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作为教师，我们要圆的首先是中国的教育梦。

近年来，全国许多高校都在讨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无疑，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许多高校的教育梦。在我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教育的职责，更好地教书育人，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提供更加优秀的人才。

教育除了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更新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以外，还应向受教育者提供许多“亘古不变”的东西，比如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植入，品行、修为的培养，智商、情商和灵商的开发。无论时间如何流逝，知识如何更新，上述内容都应始终存在于高等教育之中，成为学校培养目标的基石和灵魂。如果人们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说，“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种评价的精髓是对由这个人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好品行、好修养、高智商、高情商和高灵商的一种褒奖。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大写的人”，应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孝顺、善良、宽容、真诚。这种基本素质的养成，无疑需要包括社会、家庭、学校在内的各方的积极影响，更需要教师去言传、去身教。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为一流，当然是在一流学生的培养、一流文化高地的占据、一流科研能力的展示等方面具有全方位的高水平。在我看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之所以成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尊重和遵循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少一些一刀切式的评估，多一些多元化的发展；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学术自由；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从长计议；既有知识体系的传授，更有创新能力的培养；既有学术的传承，更有新的突破；既有对探索的宽容，更有对真理的敬畏，那么，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也只是时间问题。

十年前，我曾谈到我的北大梦：“我梦想在不远的将来，北大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教师不再为现实的评级压力所烦扰，而是都能‘气定神闲’，潜心学术，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学生不再为光怪陆离的功利诱惑所俘虏，而是都能沉浸于北大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宽广的现代文明之中，锻造自己，发展自己”。我的北大梦可能并不宏大，但我认为这应是高等教育应有的氛围和追求。我的北大梦也许并不高远，但没有每个人的艰辛努力也难以成真。民族复兴，当以教育为本。从这个意义上，北大梦、教育梦与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紧密相连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愿意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忠实履行一位教师的神圣职责，为圆梦而殚精竭力。

来源：人民日报 2013 年 04 月 19 日

大学与社会的多边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

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大学不可能只有与政府的唯一边界，而是要建立与社会、与社区、与家长、与校友的多重边界，而且与多方的关系是平等的。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唯一的边界，就是大学和政府的边界。大学只要和政府的关系不断，大学就能维持资源的供给，人员的保障，办学资格的保障，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根本不去问社会需求什么，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是什么。如此几十年，居然还能将大学办下来，当然其沉重的代价最终还是由普通纳税人承担。

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大学不可能只有与政府的唯一边界，而是要建立与社会、与社区、与家长、与校友的多重边界，而且与多方的关系是平等的，与政府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该是上下的关系，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基础应当是法律，是政府与大学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而不再是一道又一道的行政指令。

市场是大学与社会关系不可缺少的通道，大学办得好不好，公众会自主地依据自己的判断用脚投票。大学要通过市场会聚人力、吸纳资源，也要通过市场准确了解人力资源的社会需求，定位自身在分层满足社会需求中的准确位置，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大学的产、学、研等各项活动只有不脱离市场，才能保有活力。大学不可能再依赖政府或计划来解决这一问题。

当然，市场和用人单位也不能因此在大学面前高人一等。大学要了解用人单位和市场的真实需求，但不是简单听命于他们，而是将这些要求通过大学的独立思考转换为大学的人才培养计划。大学不可能直接培养出各种工作岗位上的熟练工，大学所能做的是使学生具有适应各种岗位，并能尽快转变为熟练工的基本素质。

大学建立多边关系的社会不只是一国、一省，更不可能是一个城市和地区，那些要求大学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口号本身是违背大学内在特性的，是要扼杀大学的生命的。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大学所要建立多边关系的社会是整个人类的社会，即便对社区大学来说也是如此，否则它就不够称为大学的资格。因为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才能走向社会的中心而非在权势的羽翼下发出异于人类大学的怪叫。

由于大学是将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工作场域和服务对象，它们有条件的都在力争成为不分国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库、知识库、思想库和新型产业的孵化器，它们会毫不顾及中国保守观念进入中国。中国若以被动心态应对就会成为万国大学博览馆，若以防避的心态应对就会走向继续封闭和落后，若以正常心态应对，政府就要尽快放弃对大学的圈养和束缚，让中国的大学不仅面对国内市场，而且要面向国际市场，全面规划自身的发展。

长期以来，大学与社区的关系很隔膜，产生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就将大学与社区置于分裂与对立的位置，大学无法自主建立与社区的关系。遍观世界各国大学，基本上与当地社区融为一体，而几乎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都要用高高的围墙将自己与社区分割开来，用雄伟的大门显示自己比周边高一筹的地位。这本身是一种封建等级观念在大学外形中的体现。有人或许还要以治安为由论证大学花巨资建围墙的必要，世界各国大学的例证足以驳倒这个理由。

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何中国大学放在社会中就不安全了？因为中国大学与社区之间不是一般的分离，有时甚至是对立；它们不仅不承担社区的责任，还常常损害社区的利益。只有在内心上大学与社区融为一体，围墙才是完全不必要的。大学与社区难以融为一体，又是由于大学存在政府这一强势单一的边界，使大学难以真正做主，将大学与社区分拆开来。

正因为此，有人建议改变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一是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主要职能将是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调控和为高等学校的发展提供服务。二是政府将消除对高等学校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职能。属于学校办学自主权范围的事，政府将不进行干预。三是在目标管理方面，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进行需求预测和制订发展规划；制订和实施教育标准；对学校的教育活动进行评估和监督。四是在过程管理方面，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进行筹资和拨款；利用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教育发展的总体规模、教育结构和地区布局。五是政府对教育的行政管理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而不取决于行政首长的意志。六是要建立必要的审议、咨询、评估机构，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促进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在世界上不少优秀的大学中，校友是大学的永久成员，校友会也是十分有影响力的组织。校友们不仅心甘情愿地不断给母校捐款，还直接参与母校的事务，甚至校长的遴选之类的重大决策。

大学与社会的多边关系还包括建立与企业家的关系，与著名非本校学者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的关系。大学与外界的关系越多边、越广泛、越平等，显示出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正常、越稳定、越有效、越自主、越健康。这样的大学才会处于一个相对良性的自然生态之中。相反，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单一，就会越不正常、越不平等、越没有效率、越不稳定、越难以自主。大陆的大学正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只和政府建立关系，顶多还和市场建立关系，这样的关系就将大学裹挟在非现代大学之列。

大学与社会多边关系的存在不仅仅是一起开开会、吃吃饭，而是要建立真实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可能会有矛盾。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平等协商，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或胜负。大学对社会的引领本身也不能强制，而是以“酵母”发生作用的方式，以社会乐于接受的方式发挥作用。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4-18

教育形象现状总体趋好

影响教育形象的主要因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曾天山

各行各业因其独特的历史使命、理想追求、工作性质和行为方式，逐渐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行业形象，形象问题至关重要，关系自身信心和社会认可。教育形象是最受公众瞩目的行业形象之一，其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和教师的形象，历来以“社会净化器”和“安贫乐道”的评价赢得社会的尊重，以致人们用象牙塔、社会良心和春蚕、蜡烛、园丁来比喻与颂扬。但教育界并非世外桃源，也受到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公众认知、媒体宣传、社会风气等因素影响，局部出现过度行政化、市场化倾向，也有庸俗、低俗、媚俗表现，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困扰着教育形象，引起社会非议，虽经治理仍有起伏。60 多年来，随着世风变化，教育形象走过了一个“W”形历程，在社会热点中呈现出“M”形走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和国家形象，对此应高度重视，需要认真分析引发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凝聚共识，增强合力，坚持方向，坚守底线，树立风清气正的形象，发挥好政府主导责任，发挥好社会支持作用，发挥好学校重要责任，发挥好教师主体责任，沟通大众媒体，善待社情民意，强化教育的精神力、执行力和感知力形象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中国教育梦想。

教育形象是社会百业形象的缩影，反映着社会变迁和时代要求。许多问题启迪于家庭，发育在学校，发难于社会。教育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教育行业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具有较为确定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特征，涉及教育自身的威信和声誉，关系到育人环境的优劣和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教育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是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重要标志。在公众的传统印象中，教育是高尚的事业，学校是知识的殿堂，教师是神圣的职业，教育形象总是和学校的形象与教师的社会声望紧密联系。

管行业必须管形象，管形象必须管行风，管行风必须管校风、教风、学风。全国 50 多万所学校，1700 多万名教师，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位教师都是教育形象的代言人，都有责任维护和提升教育的良好形象。

教育形象在变中有进

新中国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教育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推进了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得到人

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学校是社会的净化器”，“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这些评价反映了社会大众寄予校长和教师的期望与信任，偶尔有不和谐的音符，也不能磨灭绝大多数人对学校和教师的尊重。

（一）教育形象现状总体趋好

教育形象是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精神形象的四位一体。教育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人人都是教育的利益相关方，人人都是教育家，人人都是批评者，评价教育既是主观感觉，又有客观认识，既有共同看法，又有个体差异，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发展特性。

社会舆论是一面镜子，群众意见最重要，他们的认可、赞扬、美誉是教育形象的最好反映，口碑比奖杯更有价值。通过民意调查，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听民言、知民愿、解民忧、顺民意，使主观感觉客观化、零散经验系统化、混杂信息精确化，畅通了群众的诉求渠道，准确了解到社情民意。

一是教育满意度上升。2010 年，据腾讯网和人民政协报联合调查显示，社会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满意度达到 73%，认为这是一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不回避矛盾和问题，有许多亮点和创新点。2011 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的联合调查显示，群众对落实教育规划纲要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达 78.3%。

二是教育行风评议良好。由政府组织的行风评议活动深入开展，涉及各行各业，每年参加行风评议的各界群众达 6000 万人。2011 年，教育部首次采取第三方评价教育行风建设，72.7%的受访者认为好或比较好。

三是群众投诉量减少。2011 年群众对教育问题的反映比 2010 年下降 12.4%，其中涉及乱收费的反映下降 39.4%。是年，国务院信访局和国务院纠风办分别收到关于教育乱收费问题来信 109 件和 234 件，分别比上年下降 37%、6.77%，全国 1188 个县区市实现零投诉，占全国县区数的 41%。

四是案件发生率下降。2004 年，仅山西省教育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就受理群众举报 2392 件，共立案 491 件，结案 439 件，涉案人数 453 人，其中受到党纪处分 97 人，政纪处分 322 人。2011 年，全国教育纪检监察系统共立案 3349 件，结案 3133 件，2903 人受到处分；查处和纠正违规问题 771 件，涉及金额 5.09 亿元，处分 3696 人。

（二）教育形象在曲折中好转

教育形象从解放初期的光荣形象到“文革”的重灾区，从改革开放的先锋到市场经济的失落，从经济建设的基础到社会建设的重点，走过了一条“W”形的曲折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甩掉了政治上“臭老九”的帽子，逐渐从妖魔化中走出，成为受社会尊重和羡慕的人才，从事着“传道授业解

惑”的高尚职业。

一是形象上升期（解放后到“文革”前）。新中国，教师永远不会失业，教师被赋予春蚕、蜡烛、园丁、灵魂工程师等尊称，全国模范教师史瑞芬和毛泽东主席共进晚餐，全国首批特级教师霍懋征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

二是形象下降期（“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泛滥，“白卷英雄”、造反派和“大老粗”成为时代英雄，“两个估计”使教育跌入深渊，学校成为阶级斗争的阵地，教师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

三是形象上升期（20 世纪 80 年代）。“尊师重教”家喻户晓，春蚕、蜡烛再度被人们记起，奉献、付出重新成为主流，教育被国家列入优先发展的行业，教育形象受人尊重，教师节和教师法让教师完成了从“臭老九”到知识英雄的蜕变，当教师很光荣，是件自己自豪、别人羡慕的事，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投身到教师行列。

四是形象下降期（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从政治课本走入现实生活，“脑体倒挂”明显，教育经费短缺，教育陷入困境，教师被“妖魔化”，关于教育经费少、负担重、评比多、扩招猛、向钱看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学校和教师队伍面向市场了，有的学校招收择校生，有的学校破墙开店，部分教师自主流动，转行下海成为时尚，部分教师有偿补课。

五是形象上升期（新世纪以来）。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建立，全国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公办普通高中全面实行“三限”政策；高校招生实施“阳光工程”；全面健全贫困生资助体系；纠正、废止了一批违背国家教育收费政策的文件规定，仅 2003 年，各地即取消教育违规收费项目 2800 多项，降低收费标准 1300 多项，涉及金额 18 亿多元。这些措施提高了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2006 年，据盖洛特等开展的“您心目中的教师形象”调查，大多数人对教师怀有深厚的感情，知道教师节的意义，并会付诸行动表达尊师之情。这都说明，经过了数次阵痛，教育形象回归本位。

（三）教育形象在社会大环境中逐渐改善

一些行业以职业特权牟取私利等不正之风时有发生，这种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群众强烈不满。1990 年 3 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成立，纠风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教育逐步成为与医疗、住房、物价、食品安全、社保、就业等一样热门的话题，这些与百姓民生紧密相关的话题有无限的生命力，在治理和惯性之间此起彼伏，总体上走过了“M”形曲折道路。

一是教育热点沉寂期（解放初至“文革”前），社会关注着政治斗争、干部腐败、走后门等现象，教育形象正面，教育问题沉寂。

二是教育热点治理期（“文革”时期）。教育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热点领域，高考废除，学校停

课，教师受批判。

三是教育热点沉寂期（20 世纪 80 年代）。治理重点是一些权力部门和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社会服务部门，重点解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问题，吃拿卡要问题，“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问题，“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中小学因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遭受社会非议。

四是教育热点升温期（20 世纪 90 年代）。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问题暴露最尖锐时期。教育与医疗、住房、司法等部门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一些地方乱收费的项目达 25 种之多。据 2001 年底两家调查机构对京、沪、穗等三市的调查，54.3% 居民认为教育收费增长过快，超出半数以上居民的承受能力。其中北京两项指标遥遥领先：50.8% 的小学生家长交过择校费，人均交费 4767 元，与大学生学费标准持平，相当于同期全市职工年人均工资的 1/3。

五是教育热点降温期（新世纪以来）。2002 年 8 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价格、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乱收费等的举报。通过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如 2006 年全国免除农业税。2007 年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构建社会保障网。2008 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两免一补”，奠定了教育热点降温的基础。2010 年，中宣部理论局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从影响百姓生活的诸多问题中梳理出“怎么看我国发展不平衡”、“怎么看就业难”、“怎么看病难”、“怎么看教育公平”、“怎么看房价过高”、“怎么看分配不公”、“怎么看腐败现象”等 7 个社会集中关注的热点问题，教育问题已经缩小到公平领域。在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 2011 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中，7 项主要任务教育名列最后，主要针对中小学办学规范问题。综合新华网、人民网等组织的“2012 年两会调查”结果发现，网民最关注的“五个热点话题”分别是：社会道德建设、食品安全监管、缩小贫富差距、房产市场调控和加强反腐倡廉，教育话题逐步淡出。

教育形象在地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01 年，沈阳教育系统的群众满意度在被评议的 30 个重点部门中排名倒数第一。经过整顿，曾连续 3 年在全市行风评议中排名末位的沈阳教育系统，一跃成为全国教育行风建设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习的典范，群众满意率从 2003 年的 63.1% 上升到 2006 年的 90%，群众投诉举报率下降了 92%。青海省教育系统在政风行风民主评议测评排序中，多年处于行业管理类后三位，一度是群众质疑最多的行业之一；经过治理，2008 年，教育系统排名跃到第四位；2009 年再跳到第二位，2010 年位居行业管理类第一位，2011 年蝉联行业管理类第一，行风建设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影响教育形象的主要因素分析

教育形象的种种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公众认知、媒体宣传等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教育形象是一种社会综合征。

（一）与经费投入有关

“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国情，使教育陷入多难境地。以占世界 1% 的教育经费承担了世界 23% 的受教育人口，导致了诸多矛盾，如受教育人口日益增多与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家庭支付能力有限的矛盾，进而使教育陷入欲扩大规模而又无力扩大、欲满足群众教育需求而又不能加重群众教育负担的状态。这使得教育经常处于“进亦忧，退亦忧”的困惑中。中小学乱收费、家庭分担教育成本份额过大，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直接相关。有些地方教师待遇低、不稳定、进取心减弱，与政府落实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不到位有直接关系。

（二）与政策导向变化有关

对教育性质一度认识模糊，如有人依据 1992 年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教育确定为第三产业，以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内需的思想进入政策层面；有人依据 1993 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始了公办学校实行“民营机制”的“转制学校”的尝试，一些引发争议的“盘活国有教育资产”、出卖公办学校的“改革”，后又强调教育公益性。

（三）与社会风气有关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 0.4，进入少数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行列，社会风险累积，利益主体分化，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教育难以独善其身，教育形象好坏绝不是简单的行风问题，不少问题其实是社会不良倾向在教育系统的反映。行风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国家治理力度大，社会风气就会好转，进而带动教育形象的好转，反之会消极影响教育风气。

（四）与职业素养有关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当允许市场机制推动部分教育发展时，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暂时利益的诱惑下表现出急功近利倾向，如在办学上盲目攀比，引起规模、结构失控，效益、质量下降等；部分教师狭隘的价值观念和心里失衡，导致进取心减弱和职业道德滑坡，从个人利益出发决定对工作的取舍和投入精力的程度，校内上课敷衍了事，把主要精力放在校外兼课赚钱上，威信不够脾气补，知识不够距离补。

（五）与公众认知有关

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教育期望值越高，对教育现实批评越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培

养了 4000 多万大学生，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9.5 年，他们参照系多样，固守“学而优则仕”，“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改变命运”等观念，面对独生子女和人才高消费的现实，对教育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据有关数据，2010 年国内近 100 万人放弃高考，其中出国留学占 21%。

（六）与媒体宣传有关

总体状况是：主流媒体意见少，教育媒体颂德多，社会媒体批评多，网络传媒流言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所学校的不规范、一个教师的无德，经过社会媒体报道，被无限放大成我国教育的普遍现象，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字眼让教师俨然成了十恶不赦的“眼镜蛇”，在人们心里形成了不好的印象。如武汉一中学誓师大会标语“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河南某学校差生伺候优秀生吃饭，陕西某学校让差生戴“绿领巾”……在猛烈的大众传媒攻伐中，公众实际上对教师采取了双重价值评价标准，既要求坚守清贫，又要求德才兼备。在当下一些颇有影响的影视作品中，教师、校长形象或是说教式的悲情人物，或是萎缩的小人物，如《乡村爱情》里的皮校长、《马大帅》里的马校长和他的同事们等。

合力加强教育形象建设

教育形象建设重点在学校，基础在教师，责任在政府，关联在社会，需要内强实力，外塑形象，增强服务意识和公关能力，化解矛盾，减少投诉，平息不满，促进教育形象的根本好转。

（一）育人为本，服务至上

以人为本、专业服务是提升教育形象的核心。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是充满爱的事业。作为联系千家万户的教育，更应把积极服务作为推动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要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导向，从促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出发，增强教师、家长对学生成长的共同责任感，努力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促进人人成才。要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站在学生角度思考问题；站在家长立场积极服务，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因材施教，在平凡、普通、细微甚至琐碎中体现服务。

（二）提高质量，强化特色

质量是提升教育形象的根本。要明确标准，增强特色，在历史比较中提升质量，在同类比较中提升质量，在社会评价中提升质量，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质量。

（三）加强管理，克服短板

管理监督是提升教育形象的制度保障。应通过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手段，克服急功近利，以行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以部门利益服从民族利益，以单位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以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四）融入社区，贡献社会

融合社区是提升教育形象的重要手段。要植根社区，融入社区，增强责任，贡献社会，树立正面形象。

（五）优化环境，引领风尚

优化环境是提升教育形象的重要基础。应美化校园环境，增强环境育人；调整人际关系，提高教育危机管理能力，优化心理环境；善用媒体，优化社会环境，加强正面宣传，控制负面新闻发酵，重视业内外媒体，关注国内外影响，扩大社会理解和支持。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3 年 04 月 15 日

大学文化建设需走出误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

一直以来，大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社会文化起着引领和辐射作用。当前，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培育优秀大学文化，需要走出误区。

大学文化建设存在误区

一是将大学文化等同于“校园文化”。大学文化并不局限于校园文化，校园文化主要指学生文化活动，侧重于“第二课堂”、“文化氛围”，是以师生文化活动为主体，由校园中所有成员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共同创造而形成的学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大学为了完成治学育人任务而营造的一种大学环境文化。校园文化的层次和内涵没有大学文化明确和丰富，也不具备大学文化所体现的科学人文精神的底蕴。此外，随着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学文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校园，大学文化的研究已将社会纳入视野，因此“校园”这个区域概念不能反映出大学文化的视阈。

二是重物质文化轻精神文化。在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往往因为精神文化建设在短期内不大显效，而物质文化建设见效快，因而形成了“重物质、轻精神”的做法。国家发展要靠精神的力量，大学发展同样要有精神支撑。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要素，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没有精神的物质文化载体是缺少“灵魂”的。对于一些新建的大学如何培育自己的大学精神任重而道远，对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其大学精神。

三是认为大学文化建设只是一项局部工作。很多人认为大学文化建设是学校某一个或几个部门

的事情，是一项局部的工作。其实，大学文化包含了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价值观念、规章制度、教学科研、师生行为、校风学风、学术氛围、校园环境、建筑景观等，几乎涉及大学的方方面面，大学文化建设需要全校各部门、院系、单位团体共同组织实施，全体师生共同参与。

怎样走出大学文化建设误区

任何一所大学的文化特征都不会在短期内形成，而是伴随着大学的发展长期积淀而成。走出大学文化建设误区，当前可以按照树立理念、整体规划、构建平台、建立机制的思路来落实。

树立理念。树立大学里的一切活动都是大学文化建设内容的理念。推进大学文化建设，要走出单一的、表面化的校园文化建设，变单一的校园文化建设为综合的大学文化建设，注重大学理念的形成和师生价值观的统一，让大学的历史和现实、建筑景观、活动制度、师生言行都渗透浓厚的文化特点，培养大学人的人文素养，激发师生思考创新的热情，从而构建全方位的育人文化氛围。

整体规划。在以往大学发展规划中，往往重物质指标体系的设计，忽视对大学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思考和关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传播全球化的时代，重视大学文化建设，无论是对大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对社会以及全人类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学文化建设应成为大学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大学文化建设纳入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规划等工作统一协调，共同推进。

构建平台。一是构建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提升教师文化素质。教师是大学文化的参与者、践行者和建设者，大学文化建设的每一项工作都要依靠广大教师。为教师提供各种发展平台，有利于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二是构建学生发展辅导平台，提升学生文化素质。将大学文化建设与提升教学、科研、管理水平，与校风、学风、教风建设，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育人格局。三是构建科研创新平台。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校长多年的唐纳德·肯尼迪在其名著《学术责任》一书中认为，“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它给人类提供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大学应把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作为文化创新的关键点。四是构建文化传播平台。要发挥大学文化传承与传播功能的优势，加强文化载体建设，向社会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引领社会前进。

建立机制。大学文化建设机制应着眼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内部建立基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三个层面的运行机制，有总体规划、重点任务，还要有评估反馈。外部机制着眼于处理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以及大学间的关系，建立政府对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机制、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机制、大学间联动共进机制。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3年04月12日